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二七編 第十冊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上)

白星飛 著

花木蘭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0 冊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上)

白星飛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上）／白星飛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 107〕

目 2+26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第 10 冊）

ISBN 978-986-485-568-1（精裝）

1. 春秋史 2. 史料 3. 史學評論

011.08

107012290

ISBN-978-986-485-568-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七編 第 十 冊

ISBN : 978-986-485-568-1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上）

作 者 白星飛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41033 字

定 價 二七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上)

白星飛 著

作者簡介

白星飛，男，1992年生，江蘇常州人，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學化學院（歷史文獻學方向）碩士，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隨導師侯乃峰老師學習先秦史和出土文獻學並進行相關研究。現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文獻分社編輯。

提 要

鄭國是春秋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諸侯國，鄭國史的研究歷來受到學者們的足夠重視，相關研究成果頗豐。出土金文與簡帛文獻中也不乏與鄭國史相關的內容，對鄭國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

本書收錄與鄭國史相關的簡帛文獻及青銅器銘文，借鑒並吸收學界已有的成果，形成集釋，在集釋的基礎上對鄭國早期的歷史地理和史事、鄭國的姓氏、不同於傳世文獻的出土鄭國史料、喪葬禮制進行研究。

《鄭文公問太伯》篇中提及非常多的鄭國地名，對了解鄭國早期歷史地理大有裨益。簡文所載為鄭桓公滅鄆之說又添一例證。此外，據清華簡《繫年》和《鄭文公問太伯》中的相關記載，鄭武公時期鄭國或已稱霸於東方諸侯。

簡帛金文中出現的大量鄭國人名，對研究鄭國的姓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據清華簡可證實前人將鄭國的堵氏與洩氏混同之誤。據清華簡《良臣》《子產》篇的記載，可推測鄭國有王子氏，王子嬰次爐之器主亦當出自鄭國之王子氏。封子楚簠的器主當與清華簡《繫年》所見「子封子」相關。

出土文獻中與傳世文獻所載難免會存在不同之處，清華簡《繫年》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六章，上博簡《鄭子家喪》篇所見鄭國史事與傳世文獻記載均存在差異。清華簡《繫年》可信度較高，其中一些記載可糾正傳世文獻之誤。上博簡《鄭子家喪》與子書類似，重說教不重史實，當以辯證的態度對待之。

《鄭武夫人規孺子》和《鄭子家喪》中所見的喪禮用語，印證了禮書以及其他傳世文獻中相關喪葬禮制的記載。《鄭武夫人規孺子》反映了春秋時期諸侯的葬禮；通過《鄭子家喪》篇，可深入了解春秋時期犯下重罪的卿大夫死後用以降低其葬禮等級的一系列措施。



目次

上 冊

緒 論	1
一、研究背景	1
二、學術史回顧	3
三、研究內容	15
一、簡帛文獻所見鄭國史料集釋	19
(一) 包山楚簡涉及鄭國史內容集釋	20
(二) 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伯有章》集釋	28
(三) 上博簡(七)《鄭子家喪》集釋	35
(四) 清華簡所見鄭國史料集釋	80
1. 清華簡(貳)《繫年》涉及鄭國史內容集釋	80
2. 清華簡(叁)《良臣》相關內容集釋	114
3. 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集釋	118
4. 清華簡(陸)《鄭文公問太伯》集釋	166
5. 清華簡(陸)《子產》篇相關內容集釋	211
6. 清華簡(柒)《晉文公入於晉》涉鄭國史內容集釋	251

下 冊

二、青銅器銘文所見鄭國史料集釋	263
三、出土文獻所見鄭國史料相關研究	339
(一)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篇所見地名分析兼談鄭國早期史事	339
(二) 出土文獻所見鄭國人物姓氏整理研究	362
(三) 涉及鄭國史出土文獻中不同於傳世文獻記載之處辨析	384
(四) 與鄭國史相關出土文獻中所見喪禮用語研究	393
參考文獻	405
後 記	415

緒 論

一、研究背景

鄭國爲春秋時期的一個次等大國，雖不如晉、楚、齊、秦那般強盛，但在春秋歷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鄭國爲姬姓國，乃周厲王少子桓公友之封國，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806 年）始封桓公友於鄭。據《國語》記載，鄭桓公於幽王時爲周王室司徒，當時幽王失德，王室衰微，桓公聽從史伯的建議，東遷至虢、郕一帶。西周滅亡，桓公亦死難。平王東遷，其子鄭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周室，《國語·周語》所載「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註 1〕，說的便是此事。此外，據清華簡記載：「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註 2〕，說明當時鄭武公已成爲東方諸侯之長，鄭國國勢已相當強盛。春秋初期秦、晉、楚、齊尚未興起，這段歷史則是以黃河中下游魯、衛、鄭、宋諸國的爭雄以及鄭國與周王室的衝突爲主。

鄭國於春秋初年強橫一時，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註 3〕，在與宋衛等國的爭衡中佔據絕對優勢，甚至挑戰周王權威，擊敗周王所率聯軍，周鄭交質，鄭國於春秋初期幾爲霸主。然而鄭莊公死後鄭國內亂，莊公諸子鬥鬪斬伐，鄭大夫祭仲、高渠彌專權，甚至左右鄭國君主的廢立，使得鄭國陷入內亂並很快淪爲二流國家，雖說鄭厲公之野心及手段不輸於鄭莊公，但是其在位時間並不長，無法使鄭國再度興起。隨著齊、秦、晉、楚的興起，鄭國也逐漸淪爲大國的附庸。雖然鄭國疆域並不大，但是其西鄰周王室，北有晉，

〔註 1〕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第 44 頁。

〔註 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 12 月，第 138 頁。

〔註 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0 月，第 68 頁。

南有楚，東與宋、衛、陳接壤，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鄭國成為大國爭霸的中心，楊伯峻先生曾指出「欲霸中原，必先得鄭」〔註4〕。秦、晉、楚這些大國都曾對鄭國虎視眈眈，秦晉關係徹底破裂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兩國對於鄭國的爭奪；春秋中後期，鄭國長期遭受晉楚兩國軍事以及經濟上的雙重壓迫，國內矛盾極其尖銳，國家長期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其內政較之其他國家更為難治。雖說子產的出現使得鄭國的處境得以改善，甚至出現中興之勢，但終究無法使鄭國擺脫衰亡的命運，鄭國於鄭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375 年）為韓所滅。

綜觀春秋歷史，鄭國的地位雖不及晉楚這些大國，但是談及春秋史，沒有人會忽略鄭國的存在。鄭國從春秋初期的一方雄主；到之後國內的大亂，莊公的諸位公子以及鄭國權臣之間相互鬥鬪斬伐；再到春秋中後期成為晉楚兩個大國爭奪和拉攏的主要對象；再到在當時與孔子齊名的子產治鄭，其對鄭國的治理卓有成效，使得國家和人民都得到了相當的利益。鄭國的歷史獨具特色，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春秋中後期早已是禮崩樂壞，諸侯國不尊周王，到了諸侯國內也是「上行下效」，卿大夫多不尊各自的君主，國內政權多由世族掌控，鄭國則有良、由、國、罕、駟、印、封七穆之族。由於鄭國具有非常優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其商業在春秋時期最為發達。從春秋初期到春秋末年，鄭國始終具備很強的軍事實力，鄭國的「魚麗之陣」也是春秋時期有名的戰陣。鄭國毗鄰周王室，禮法方面也多沿襲周禮，鄭文化地位雖不及魯文化，但仍是春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鄭國的發展歷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獨具特色，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自從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大量的簡帛文獻資料出土，與甲骨文、金文、敦煌遺書、明清內閣檔案一樣，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新材料。這些新出土的簡帛材料一方面豐富了古代歷史的內容，修正並補充了傳世史書的記載；另一方面還可以作為校勘某些傳世典籍的依據以及研究語言文字的原始素材。

前人對於鄭國史已做過很多深入的研究，然而在清華簡第六輯公佈之前，並無大篇幅的關於鄭國史的出土文獻可供學者參考，雖說上博簡第七輯中的《鄭子家喪》與鄭國存在密切聯繫，但該篇文獻為楚國文獻，其主人公為楚莊王。在清華簡公佈之前，涉及鄭國史的出土文獻雖說不是很少，但是

〔註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第988頁。

非常零散，大多為金文，簡帛文獻中也只有零星的幾句話涉及鄭國史。前輩學者們對於鄭國史的研究還是以參照《詩經》《左傳》《國語》等傳世文獻為主，輔之以青銅器銘文。

清華簡第六輯中的《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和《子產》三篇篇幅較長，且與鄭國歷史密切相關，其內容可印證和補充傳世文獻的記載，甚至可以根據其中的內容解決其他出土文獻中存在的爭議性問題。雖說這些出土文獻一經公佈，就有許多學者對其展開討論和研究，但是尚未有學者將所有與鄭國史相關的出土文獻加以整理並進行綜合研究。

涉及鄭國史的出土文獻包括簡帛文獻和青銅器銘文。涉及鄭國史的簡帛文獻包括包山楚簡中的兩條大事紀年、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伯有章》、上博簡（七）中的《鄭子家喪》、清華簡（貳）《繫年》中涉及鄭國史的部分、清華簡（叁）《良臣》中記載的十餘個鄭國人名、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子產》三篇、清華簡（柒）《晉文公入於晉》最末晉文公稱霸諸侯的記載。與鄭國史相關的青銅器銘文有鄭同媿鼎、鄭楸父賓父壺、叔剗父盨、鄭子石鼎、良夫盤、良夫匜、鄭伯盤、鄭莊公之孫廬鼎、王子嬰次廬、哀成叔鼎等數十件。其中如鄭莊公之孫廬鼎、哀成叔鼎均為有名的重器，相關的研究成果頗豐；而關於王子嬰次廬，其歸屬問題更是眾說紛紜。

雖說前人對於這些出土文獻的研究成果頗豐，但是仍然存在許多爭議性問題有待學者們分析解決。

二、學術史回顧

鄭國史是先秦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鄭國史的研究也受到學者們的足夠重視，前人對於鄭國史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勝枚舉。

（一）相關傳世文獻研究成果

《左傳》《國語》是研究春秋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後人所作的注疏和論著往往都包含他們對鄭國史的獨到見解，具有代表性的有清人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清人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童書業的《春秋左傳研究》、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徐元誥的《國語集解》等等。

傳世文獻所載先秦時期地名、地望的研究亦是先秦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學者尤擅考據之學，對於《春秋》經中地名的考證結果對後人研究先秦歷史地理大有補益，如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實》、高士奇的《春秋地

名考略》等。

清人顧棟高所輯之《春秋大事表》一書將《春秋》和《左傳》的基本內容都用表的形式類聚群分，進行考證和總結，其內容包括時令、朔閏、列國疆域、爵姓及存滅、都邑、山川、險要、官制、姓氏、卿大夫世系、刑賞、田賦軍旅、吉凶賓軍嘉五禮、列國爭盟、交兵、天文、五行、齊紀鄭許宋曹吞滅、亂賊、兵謀、人物、列女等，凡五十卷。如這般內容豐富、分類精細、體制龐大的春秋學著作並不多見，此書對於春秋時期鄭國歷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註5〕

陳槃的《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一書在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五《列國爵姓及存滅表》的基礎上，對春秋列國之國、爵、姓、始封、都、存滅分別進行考證和研究。此書內容豐富，條理清晰，見解獨到，書中對於鄭國始封的考證以及「鄭國滅鄆」問題的辨析都極具參考意義。〔註6〕

《竹書紀年》為西晉汲冢古墓出土竹簡的一部分，屬編年體史書，所載史事與《左傳》《史記》等傳世文獻所載多有不同。經過千年的流傳，亦可視作傳世文獻。《竹書紀年》原文雖已佚失，如今能見到的均為後人輯佚的結果，但仍然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史料。後世對於《竹書紀年》的研究著作亦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材料。如雷學淇的《竹書紀年義證》、王國維的《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范祥雍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以及方詩銘、王修齡的《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等。

許多先秦史專著都涉及鄭國歷史，其中的不少觀點都極具參考價值。先秦史的通論類著作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呂思勉的《先秦史》、徐中舒的《先秦史論稿》等等，對春秋時期鄭國歷史的敘述與分析均是非常到位。

童書業先生的《春秋史》，以《詩經》《尚書》《左傳》《國語》為主要參考材料，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語言敘述整個春秋時期的歷史，書中對春秋各國的歷史發展都有全面的分析，此書對於了解鄭國史大有裨益。〔註7〕

張以仁《春秋史論集》一書，收錄作者關於春秋史研究的論文九篇，其中有三篇是關於鄭國歷史的研究。《鄭國滅鄆資料的檢討》一文，綜合先前學者對於鄭國滅鄆問題的不同意見，得出五點結論，這些結論說明鄭武公滅鄆

〔註5〕（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6月。

〔註6〕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

〔註7〕童書業《春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

的可能性遠大於鄭桓公滅鄘的可能性；《春秋鄭人入滑的有關問題》一文，對鄭人首次伐滑時間及滑的地望進行探討，認為鄭人首次伐滑時間為周襄王十三年，即魯僖公二十年，滑的地望在河南緱氏縣；《鄭桓公非厲王之子說述辨》一文對雷學淇和陳槃二人提出的鄭桓公為宣王之子，厲王之孫的觀點進行商榷，認為鄭桓公當為周厲王之子。〔註8〕

晁福林《論鄭國的政治發展及其歷史特徵》一文，對鄭國歷史進行高度概括，將鄭國在東周時期的政治發展分為四個不同的階段，在此基礎上探討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徵。〔註9〕文章篇幅雖然很短，但對於鄭史的研究頗有借鑒意義。

關於鄭國疆域的研究，李玉潔的《鄭國的都城和疆域》一文，結合《左傳》《國語》《漢書·地理志》等傳世文獻的記載，對鄭國東遷後的都城、對外擴張和疆域進行綜合研究，得出「鄭國的疆域在今河南省的中心地區」的結論。〔註10〕

楊建敏《從〈世本〉記載看鄭國四都三遷》一文根據《世本》所載鄭國遷都之事，對鄭國「四都三遷」作進一步探討，鄭國初都絳林，徙都拾，東遷於溱、洧之間，最後徙於新鄭。文章對鄭國三次遷都的原因分別進行分析，並結合傳世文獻和相關出土文物加以佐證。〔註11〕

「鄭國滅鄘」之說一直都存在很大的爭議，古籍中所記載的觀點大致分三類：一是主張鄘滅於鄭桓公，如《竹書紀年》和《漢書·地理志》臣瓚注等；二是主張鄘滅於鄭武公，如班固之《漢書·地理志》應劭、顏師古注、張守節《史記正義》、《國語》韋昭注、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等；三是言鄘滅於鄭，但並未明確指出是滅於鄭桓公還是鄭武公，如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等。張以仁《鄭國滅鄘資料的檢討》總結前人之說，並對文獻記載詳加考證，提出鄭武公滅鄘的可能性更大。〔註12〕邵炳軍《鄭武公滅檜年代補

〔註8〕張以仁《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1月。

〔註9〕晁福林《論鄭國的政治發展及其歷史特徵》，《南都學壇（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第40～44頁。

〔註10〕李玉潔《鄭國的都城和疆域》，《中州學刊》2005年第6期，第162～164頁。

〔註11〕楊建敏《從〈世本〉記載看鄭國四都三遷》，《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第42～47頁。

〔註12〕張以仁《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1月，第205～247頁。

證》提出襲鄩而取其邑者爲桓公，滅鄩而遷鄭者爲武公。〔註13〕邵炳軍、路艷艷《〈詩·檜風·隰有萋楚〉〈匪風〉作時補證》提出鄭桓公襲鄩而取其地但未滅其國，鄭桓公死後武公繼續伐鄩，鄩滅於周平王二年。〔註14〕

關於鄭國的卿族研究，駱賓基《鄭之「七穆」考》一文對鄭國之「七穆」逐一進行考辨，得出鄭之「七穆」無國氏，子產非鄭穆公子嗣之族的結論。〔註15〕房占紅《七穆與鄭國政治》以鄭國七穆之族的政治變遷爲切入口，對鄭國以外交求生存、外交求獨立的政治特色和七穆在這些方面的作用進行全面分析。〔註16〕

到目前爲止，已有不少研究鄭國歷史的碩博論文，內容涉及鄭國東遷、鄭國的疆域、政治、經濟、文化、卿族、邦交、城市發展等各個方面。

梁霞《春秋時期鄭國外交研究》對鄭國小霸、衰落、「介居」、小幅中興等各階段外交的狀況、原因、表現和影響進行整理和研究。〔註17〕

蘇勇《周代鄭國史研究》從鄭國的建立、東遷、歷史發展、邦交、卿族、疆域和都城、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對鄭國歷史作全面、系統的綜合性研究。〔註18〕

林寶華《春秋鄭國卿族的權力維繫及其歷史變遷》對鄭國卿族，尤其是鄭國七穆之族的興起、權力維繫的特點、權力的歷史變遷進行考察研究。〔註19〕

熊棟樑《鄭國東遷歷史地理研究》對鄭國東遷相關史事進行深入分析，並對鄭國東遷所取十邑之地望分別進行考證和研究。〔註20〕

高雪《兩周之際東遷封國轉型研究——以虢、鄭爲例》一文涉及鄭國東遷過程及東遷後所處地理位置的討論以及對於周王室衰微背景下鄭國轉型過程的探討。〔註21〕

〔註13〕邵炳軍《鄭武公滅檜年代補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第31～35頁。

〔註14〕邵炳軍、路艷艷《〈詩·檜風·隰有萋楚〉〈匪風〉作時補證》，《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第38～44頁。

〔註15〕駱賓基《鄭之「七穆」考》，《文獻》1984年第3期，第40～48頁。

〔註16〕房占紅《七穆與鄭國政治》，長春：吉林大學，1999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17〕梁霞《春秋時期鄭國外交研究》，濟南：山東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18〕蘇勇《周代鄭國史研究》，長春：吉林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

〔註19〕林寶華《春秋鄭國卿族的權力維繫及其歷史變遷》，南昌：江西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20〕熊棟樑《鄭國東遷歷史地理研究》，武漢：湖北省社會科學院，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21〕高雪《兩周之際東遷封國轉型研究——以虢、鄭爲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其他如張曉的《鄭國法家文化研究》〔註 22〕、李傑的《試論春秋時期的晉鄭關係》〔註 23〕、史雪飛的《鄭國城市研究》〔註 24〕等，均從不同角度研究春秋時期鄭國的歷史。

（二）相關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涉及鄭國史的出土文獻材料包括青銅器銘文和簡帛文獻。前人對於商周金文的著錄和研究成果頗豐，因此對於鄭國青銅器銘文已經有了較為系統而又全面的研究。

如于省吾的《雙劍謠吉金文選》、楊樹達的《積微居金文說》、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馬承源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等。這些大家關於青銅器銘文的論著，都是後人研究青銅器銘文的重要參考材料，其中亦包括這些大家對鄭國金文的諸多考證和看法。

王國維之《觀堂集林》涉及領域甚廣，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部不朽之作。其中便涉及兩周金文的考釋和研究，包括鄭國青銅器銘文的考釋，對後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吳鎮烽的《金文人名彙編》是了解青銅器銘文中所見人名的的重要參考材料，書中附有《金文人名研究》。此書不僅是作者對金文中所見人名的整理彙編，書中亦包含作者對一些金文中所見人名有理有據的辨析。〔註 25〕

20 世紀以來，隨著出土文獻研究的興起，大量學者將新出土的青銅器銘文與傳世文獻記載相結合，對傳統的說法進行補充和修正。亦有學者利用青銅器銘文考證鄭國始封之地以及鄭國東遷，如尚志儒的《鄭、棫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討》〔註 26〕、李學勤的《論西周鄭的地望》〔註 27〕、李峰的《西周金文中的鄭地和鄭國東遷》〔註 28〕。按照傳統說法，鄭國始封之地在今陝西華縣，李學勤支持傳統說法並結合出土文獻對傳統說法進行補充，而尚志儒

〔註 22〕 張曉《鄭國法家文化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2011 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 23〕 李傑《試論春秋時期的晉鄭關係》，太原：山西師範大學，2013 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 24〕 史雪飛《鄭國城市研究》，鄭州：鄭州大學，2015 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 25〕 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8 月。

〔註 26〕 尚志儒《鄭、棫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討》，《古文字研究（第 1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6 月，第 438～450 頁。

〔註 27〕 李學勤《論西周鄭的地望》，《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0 月，第 40～47 頁。

〔註 28〕 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鄭地和鄭國東遷》，《文物》2006 年第 9 期，第 70～78 頁。

和李峰均主張鄭國始封之地在涇河以西陝西鳳翔一帶而非華縣。

吳其昌《金文世族譜》，開啓了利用金文資料研究西周世族之先河。韓巍的《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在此基礎之上，搜集有關西周世族的青銅器銘文，對各世族進行歸納，整理各世族的基本資料，並對相關問題加以考訂。其中亦包含作者對金文所見鄭國世族的深入研究。〔註 29〕

尹盛平《西周金文世族與宗法制度》一文中涉及鄭井以及虢季世族的考證，與鄭國早期歷史研究亦存在一定的關聯。〔註 30〕

馬超《春秋時期淮上方國金文研究》一文中亦包括鄭國青銅器銘文的整理與研究。〔註 31〕

劉麗《出土傳世文獻所見鄭國婚姻關係探討》一文通過對傳世文獻的記載分析，結合相關青銅器銘文，對西周至春秋時期鄭國與諸國的婚姻關係進行梳理，勾勒出鄭國在西周、春秋時期的婚姻政治地圖，並對鄭國的婚姻關係特點進行深入分析。〔註 32〕

前人對於鄭國青銅器銘文的研究中亦存在許多分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如下：

關於子耳鼎（寶登鼎）銘文中的「鄭噩叔」，張莉認為是「鄭伯克段于鄆」事件中的共叔段〔註 33〕，馬超認為銘文中的「噩」字當釋為「喪」，「鄭喪叔」為鄭穆公之子——公子去疾，即入楚為質的「子良」〔註 34〕。

關於鄭臧公之孫鼎銘文中的「鄭臧公」，黃錫全、李祖才認為是鄭襄公〔註 35〕，吳鎮烽、李學勤認為是鄭莊公，李學勤提出器主為鄭莊公之裔孫〔註 36〕。

〔註 29〕 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7 年博士學位論文。

〔註 30〕 尹盛平《西周金文世族與宗法制度》，《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1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10～25 頁。

〔註 31〕 馬超《春秋時期淮上方國金文研究》，合肥：安徽大學，2014 年碩士學位論文。

〔註 32〕 劉麗《出土傳世文獻所見鄭國婚姻關係探討》，《出土文獻（第六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4 月，第 32～54 頁。

〔註 33〕 張莉《登封告成春秋鄭國貴族墓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第 5 期，第 74～80 頁。

〔註 34〕 馬超《春秋時期淮上方國金文研究》，合肥：安徽大學，2014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 17～21 頁。

〔註 35〕 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 年第 9 期，第 855～858 頁。

〔註 36〕 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8 月，第 325 頁。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中華國學研究》創刊號，2008 年 10 月；

關於王子嬰次爐的歸屬問題，王國維認為銘文中王子嬰次為楚令尹子重，此爐為鄢陵之戰楚軍之遺器〔註37〕；郭沫若認為王子嬰次為鄭莊公之子，鄭子嬰〔註38〕；楊樹達、張頴等均贊同王子嬰次為楚令尹子重，楊樹達對此爐為鄢陵之戰楚軍遺棄於鄭之說提出質疑〔註39〕；孔令遠認為王子嬰次爐為春秋晚期徐國之器〔註40〕。

涉及鄭國史的簡帛文獻大多公佈時間不長，相關研究尚不成熟，研究成果仍是以學術論文為主。前人對涉及鄭國史的出土文獻提出過許多獨到見解，但往往各家說法不一，相關簡帛文獻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許多爭議性問題。

關於包山楚簡中「魯陽公以楚師後城鄭之歲」的年代，劉彬徽《從包山楚簡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一文推測為公元前320年〔註41〕；何浩《魯陽君、魯陽公及魯陽設縣的問題》一文推算為楚懷王八年（公元前321年）〔註42〕；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估計不出楚宣、威二王（公元前369～329年）在世的40年間〔註43〕；陳偉《包山楚簡初探》一文根據楚曆推算魯陽公城鄭之歲為公元前320年的可能性較大些〔註44〕；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認為該大事紀年的絕對年代為楚懷王九年（前320年）〔註45〕；李學勤《論包山楚簡魯陽公城鄭》據相關傳世文獻推測魯陽公城鄭之歲當在公元前394年〔註46〕。

後輯入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4月，第166～170頁。

〔註37〕 王國維《王子嬰次爐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6月，第899～901頁。

〔註38〕 郭沫若《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04卷·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10月，第91～100頁。

〔註39〕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第277頁。

〔註40〕 孔令遠《王子嬰次爐的復原及其國別問題》，《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4期，第30～33頁。

〔註41〕 劉彬徽《從包山楚簡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533～547頁。

〔註42〕 何浩《魯陽君、魯陽公及魯陽設縣的問題》，《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第47～51頁。

〔註43〕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19～320頁。

〔註44〕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第18～19頁。

〔註45〕 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1月，第6頁。

〔註46〕 李學勤《論包山楚簡魯陽公城鄭》，《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第30～32頁。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一文最早提出《春秋事語·伯有章》中的「閔子辛」爲「閔子騫」。^{〔註47〕}學界多讚同其說，並對此說加以補證。而裘錫圭、龍建春曾對此說提出過質疑^{〔註48〕}。

張新俊《〈鄭子家喪〉「厯」字試解》一文指出《鄭子家喪》簡文「以邦之變」的「邦」指的是楚國，據《左傳》的記載，鄭子家弑其君鄭靈公之事發生在公元前605年，這一年楚國的政局正處在動蕩之中。「邦之變」指的是《左傳·宣公四年》所記楚莊王九年楚國所發生的內亂。^{〔註49〕}

馮時《〈鄭子家喪〉與〈鐸氏微〉》一文，通過對《鄭子家喪》文本的釋讀以及竹書編寫特點的分析，認爲《鄭子家喪》的撰寫特色與《鐸氏微》相吻合。《鄭子家喪》當爲佚書《鐸氏微》中的一章。^{〔註50〕}

廖群《上海博物館敘事簡與先秦「說體」研究》一文，以上海博物館敘事簡爲例，揭示簡帛出土文獻對於先秦「說體」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文中圍繞《鄭子家喪》與先秦「說體」續補展開論述，指出《鄭子家喪》一段敘事，對於鄭子家弑君故事既是很好地續文，又對《左傳》的敘事，有補充和釋疑的作用。^{〔註51〕}

關於《鄭子家喪》一篇中喪禮用語的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鄭子家喪〉校讀》中根據《禮記》《墨子》等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將簡文「梨木三寸，疏索以紼」理解爲描述子家死後的葬制，解釋爲「給鄭子家用梨木製的三寸薄棺，用粗劣的絨繩捆綁。」^{〔註52〕}網友一蠱在此基礎之上，以簡文「利（梨）木三簣（寸）」與《左傳》「斲子家之棺」互相發明，指出《左傳》杜注孔疏中「剖棺見尸」說法之誤，並言《左

〔註47〕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第36～39頁。

〔註48〕裘錫圭《帛書〈春秋事語〉校讀》，《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第415～416頁。龍建春《〈春秋事語〉札論》，《台州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第5～8頁。

〔註49〕張新俊《〈鄭子家喪〉「厯」字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3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604>

〔註50〕馮時《〈鄭子家喪〉與〈鐸氏微〉》，《考古》2012年第2期，第76～83頁。

〔註51〕廖群《上海博物館敘事簡與先秦「說體」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138～143頁。

〔註52〕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鄭子家喪〉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1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584>

傳》中的「斲子家之棺」當為斲薄子家之棺，降低其葬禮等級之意。〔註53〕

代生、張少筠《清華簡〈繫年〉所見鄭國史事初探》一文，對清華簡《繫年》中與鄭國相關的史事進行討論，將《繫年》中的鄭國史事分為「兩周之際的鄭國」「大國爭霸下的鄭國」「繻公時代的鄭國」三個部分；並將《繫年》中的鄭國史料與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資料進行對比，對兩種史料加以辨析，指出《繫年》所見鄭國史料的特點。〔註54〕

王淑芳、李充《秦晉崤之戰相關問題再研究》一文，根據清華簡《繫年》第八章內容，從秦、晉、鄭三國角度出發，對崤之戰之前秦晉關破裂的原因進行分析；並對秦晉崤之戰之後的形勢加以分析。〔註55〕

魏慈德《〈上博〉與〈清華〉簡中的楚國史事輯補》一文中，作者分述清華簡《繫年》第十二、十三章以及上博簡《鄭子家喪》中與邲之戰的相關記載，並與傳世文獻中有關邲之戰的記載相對讀，進行相應的史料分析。〔註56〕

清華簡《良臣》篇中有「王子伯願」「王子百」，原整理者注云：「鄭有王子氏」〔註57〕，然《世本》中並無鄭國王子氏之記載，其他傳世文獻中亦無鄭國王子氏的明確記載。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一文指出《良臣》篇簡文所載唐虞到西周時的良臣，不少與《尚書》有關，但一部分人物的活動時代和傳統說法存在明顯不同；簡文為突出子產，特別列舉了「子產之師」和「子產之輔」，李先生猜想簡文的作者可能源出鄭國，甚至和子產有某種特殊的關係。〔註58〕

程浩《小議〈良臣〉中的「叔向」》一文，認為簡文中「後有叔向」和「楚共王有伯州犁，以為太宰」等內容的出現均與子產有關，是為特別突出子產，

〔註53〕 一蠱《由〈鄭子家喪〉看〈左傳〉的一處注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1月3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609>

〔註54〕 代生、張少筠《清華簡〈繫年〉所見鄭國史事初探》，《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242～247頁。

〔註55〕 王淑芳、李充《秦晉崤之戰相關問題再研究》，《檔案》2016年第11期，第52～55頁。

〔註56〕 魏慈德《〈上博〉與〈清華〉簡中的楚國史事輯補》，《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二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第145～165頁。

〔註5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12月，第162頁。

〔註58〕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第66～71頁。